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文学创作

10月19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长江文艺杂志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承办的“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地方性写作的理论内涵与多重面向、长江文化如何赋能新时代文学创新、多元文化格局下地方叙事的再造与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研讨会为激活文学创新、打造长江文化高地、助力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凝聚了新动能,也为进一步深化地方性写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编者

差异性与开放性

□梅 兰

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在列斐伏尔、福柯、索亚、雷蒙·威廉斯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空间从一个普遍、客观、均质、静态的容器变成通过人类行为生产出来的具有丰富文化涵义的场域。相对于抽象、超然的空间,段义孚、雷尔夫、吉尔兹等人认为“地方”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具有根植性的排他性经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稳定的地方性受到了挑战,同时出现了无地方性,以及流动、开放、多层次的地方性。当下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两种涵义,一种是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地方性,另一种是流动开放的地方性。

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一种兼具地域性与开放性的地方性写作。当人们把地理空间的长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文学地域性批评。历史上,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长江流域文化,可以与黄河流域文化形成对照。后者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北方农耕文明,产生了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而长江流域的山地、平原与沼泽等多种地貌及经济形态,孕育出与中原地区有差异的稻作文明。在文学中,长江流域也分享着同一种文化记忆,它是海上明月、江湖泛舟、竹林呼啸,是桃源归隐、小桥流水、桂香

浮动,是中国人的怀乡梦。

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长江文化视域颇具张力。因长江流域文化本身是多元的,从上游的青藏高原文化、巴蜀文化到中下游的荆楚文化、皖赣文化、吴越文化,每个文化区域的发源、发展、繁荣时期都不同。从个体经验的地方性来看,长江文化的流动性、多样性,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当横贯中部的长江将中国与世界连接,长江文化本身意味着开放、包容,是面向世界的不断进取,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以开放性视角理解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才能深刻理解从青藏高原到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性。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出现了“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诸多概念和批评热,也有批评家把这归结为事后追封或概念策划。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地方性概念可被看作改革开放40多年后,地方文化的自觉和文化身份的呼唤。确切地说,文学的地方性是文本中呈现为情感结构的地理,凸显的是个体经验在地性意义上的地方性。比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并非因为概念先行和营销,而是一批东北青年作家写出了

父辈的经历。批评家对他们的命名虽然包含各自的批评视角或目标,但更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群体指认。

在当代文学史上,长江流域的文学写作常常包含着审美迭代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崛起,先锋文学与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都在长江流域文学圈孕育发生。从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湖南的韩少功、江苏的毕飞宇,还是上海的王安忆,他们的《马桥词典》《玉米》《长恨歌》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写作,而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地性和越界性,对他者视角下的地域性进行发现、审视和批判。《马桥词典》以知青视角编纂方言词典,揭示共通的人性与生活;《玉米》通过女性的内视角,审视苏北乡村日常生活秩序;《长恨歌》则是对海派文学的反写,主人公王琦瑶的结局充满反讽。这几部长江流域的优秀长篇小说,都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性文学的超越。

从更为开放的视角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体现了当代地方性写作的差异性,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当代中国文化的缩影。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流动中确立写作意义

□陈国和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成为文学界的热词,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等概念层出不穷,仿佛我们重新进入了一个文学地理大发现时代。这股浪潮,正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过于偏向个人化、日常化写作的一种反拨与拓展,旨在将个人的写作与整体性的中国故事

连接起来。不可否认,这类写作在挖掘地域文化、抵抗叙事同质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警惕在全球化、融媒体与文旅融合的语境下,地方性写作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文化表演?我们热衷于书写长江边的古镇、码头、方言、民俗,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符号背后的真实生活现场。地方性不应只是被观赏的文化盆景,而应是活生生的、仍在呼吸的当代经验。如果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外界对地方特色的想象,那它很可能失去与真实土地的连接,成为一种被观看的地方性。

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正在于其流动的本质。它奔流不息,汇纳百川;它连接青藏高原与东海之滨,承接内陆腹地与开放沿海,贯通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真正的长江写作,应当是一种呼应其母体精神的流动性写作。这种写作不仅仅是题材上写长江,更应在精神上体现长江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动态性。它不应是回望式的文化怀旧,而应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而流动性本来就是现代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地方性写作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在地性。地方性写作不能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地域选择,更应该是一种写作姿态与方法。它要求作家真正在场,不仅是身体在场,更是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在场。今天很多写作,尽管题材是地方的,但语言是普通话的,情感是悬浮的,思维是都市中心的。这种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无地方的地方写作”。我们是否还在用一套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汉语,去书写那些本应充满泥土气与烟火气的生活?重建在地性意味着作家要重新学习倾听地方的声音。不仅是

方言,更是地方人的情感结构、思维方式与生命节奏。它不是对方言的简单搬运,而是对地方语言精神的转化与再造。

新时代地方性写作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勇敢地走向“小叙事”,并于其中窥见“大精神”。我们不必总是执着于书写长江史诗或地方传奇。相反,那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的、边缘的叙事,往往更能触及地方经验的深处。一条小巷、一个码头、一次洪水、一次迁徙都可能成为理解长江文化的切口。我们每个人与长江的关系,不必总是宏大的、历史的、文化的,它也可以是私密的、身体的、情感的。

为了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陷阱,我们或许更需要呼唤一种“野生”的地方性写作。它可能不那么符合“文化名片”的预期,甚至带有一种粗粝的、不合作的、批判性的气质。它可能由那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写作者完成,他们的写作更贴近土地的呼吸,更能捕捉到那些未被数据库收录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状态。这种“小叙事”,恰恰是對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写作的有效路径。湖北作家废斯人的大别山书写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接续楚风汉韵、朴素的原始力量。这种“小叙事”与“野生”状态,恰恰是對抗写作同质化、概念化的有效路径。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不应是一场对逝去过往的考古发掘,而应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壮丽航行。它不预设终点,不固守边界,不拒绝异质,不畏惧流动。在这场航行中,我们既是写作者,也是被书写者;既是地方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是与江水同行,在流动中探寻精神方向,在不确定中确立写作意义。它承载着长江的古老灵魂,也映照着我们鲜活的时代面容,并以奔流不息的姿态,向海而生,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以长江为钥,叩响地方心门

□吴佳燕

面又具有文化母体的属性,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成为地方性写作的“灵魂”;而地域诗学的文化底蕴与美学风格需要长江文化的滋养与赋魅,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长江文化的各种回响与不同形塑,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表达方式,对长江这部宏大、复杂、动态的“文本”进行阅读、解码、重塑和再创造,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对长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长江文化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即如何从文学地理学和大文学观的角度,如何以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为母体和坐标,去截取、梳理并呈现它所孕育、滋养且指向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面貌。一方面需将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视野,以此统领和激活不同地方的文学书写,关注这一宏大存在如何深刻而广泛地融入并影响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风俗、性格、情感和命运。比如,梳理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城市重庆、武汉和上海,会发现它们在城市性格上有很多共同特征,都具有作为码头城市的流动性烟火气,但是也有一些区别,表现在市民生活由粗粝到精细、方言语气由粗硬到柔软,以及城市的开放性和现代性等不同方面。另一方面需将长江作为审美本体,多维度呈现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聚焦文化与地域、流域与生态、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交织。长江如一

条流动的线,地方便是线上不同的点。这些点既有接续与生长,也有断裂或消失。如何发掘与聚焦“线与点”“消与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感知深度融入其中,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述路径,触及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体验,这是当下写作者的任务与使命。

第三,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地方性写作的勃勃生机都需要写作者的重发现与现代观照。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一体化进程,长江、地方和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地方为方法对作家进行指认不再有效,甚至在一些青年作家笔下,地方其实在慢慢消失。那么,如何用现代视野重新观照长江、发现地方,构建新的写作维度,找到长江文化、地域写作与个体生命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需要作家们持续地关注思考。一方面,长江文化能够塑造地方性格,比如湖北作家鄢国培、陈应松关于长江的书写,别鸣的《涉江的青铜》等峡江系列小说,都在讲述一条江与楚地楚人的故事及命运;另一方面,地方经验可以诠释时代主题,比如关于长江文化、生态文学或文化共同体的主题创作。而写作路径的拓展还需要写作者更多“走出去”,要在时代现场、生活实感和切身体验的三位一体中不断地挖掘与形塑,从而汇聚成文学的长江,前浪后浪,奔涌向前。

(作者系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

赋予文学创作更深的文化内涵

□徐 刚

今天的当代文坛,正在见证地方性写作最激动人心的蓬勃热潮。从“新东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写作”,从“文学新浙派”再到“新北京作家群”,间或“新海洋文学”与“长江流域文学”,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与新提法,令人目不暇接,亦令无数的“地方”蠢蠢欲动。

地方性写作的繁盛活力背后,体现出的是媒介对于文学事件命名的普遍焦虑,他们与业内人士一起,都在期待给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其中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于,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我在《“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文中所言,高度的流动性,早已成为今天不可忽略的文化事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地域文化概念,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京味”,与彼时同样蔚为大观的“津味”,以及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巷的“苏味”,或者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都曾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活力。然而,如我们所见,高度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于,土生土长的地方作家正在变得日渐稀少,在多元共生的年轻一代人这里,他们不再对弘扬地域文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此,从地域文化书写到地方性写作,这里所透露的时代讯息或许在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地域书写正在消失。这也难怪,现代流动性,本就是對古典主义上的地域文化的巨大颠覆和腐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我们重新召唤一种业已消失的地方,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的抚慰,抚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乡愁。如果说古典主义的地域文化写作,是与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的,具有文化的整体意义,那么后现代的地方性写作,则势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也使得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在沦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演或身份表演。并非自然生发或流露,而是“表演”出一种地方性,已然成为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在这背后,其文化诉求不难揣测。如人所见,“地方性写作+非遗”,以及“地方性写作+文旅”,正成为今天地方性写作倚赖的重要方向。

谈到地方性写作的限度问题,不禁让我想到东浩纪的成名作《动物化的后现代》,这本书一直被网络文学研究者奉为经典。该著作对“御宅族文化”中使人产生“萌”的角色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们共同使用了一种“萌要素数据库”。故事的生产者可以随意撷取这些萌要素,组合成一个个新的“萌”角色。当一个极具魅力的新角色被创造出来时,其中新的萌要素又会被拆解出来,改变数据库的构成。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这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萌要素数据库”。什么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什么是最能抚慰乡愁的地方元素,其实也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数据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只需从数据库中自由撷取某些元素就能构成一种地方性特点。而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又能不断充实这个数据库。换句话说,地方性写作有时也会沦为某种角色消费,这个时候,写作就偏离了正常轨道,角色开始变得比故事更加重要。如何对抗这种数据库写作的思维,如何将地方元素有机融入到叙事之中,同样是地方性写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长江书写的美学传统与现代转化

□刘 波

长江虽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与文化。而在文学书写中,它又体现为一种地方性的空间诗学。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东坡、王安石,乃至近现代以来的作家和诗人,长江始终是他们笔下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中原交通要塞,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长江文化书写谱系和地方性美学传统。

当代以来,书写长江题材的新诗不再局限于以单纯的风景作为题材,而是融入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像徐迟、曾卓、绿原、黄声笑、刘不朽等曾在湖北工作与生活的“老诗人”,他们在书写长江的手法上多使用宏大抒情,写滔滔江水,写码头风景,写辽阔幽远的现场质感,写奔腾不息的历史厚重。他们不仅继承了屈原在《楚辞》中的家国情怀,还坚守并开创了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不屈而坚韧的忧患意识。

到了21世纪诗人笔下,长江书写变得像湖北的很多城市一样,具有市井烟火气。他们专注于长江作为一种日常风景和生活经验的美学,将长江的象征性进行了另一种日常诗性的转换和还原。比如张执浩、余笑忠、剑男、毛子、魏天无、川上、小引、江雪、杨章地等诗人,都在不同维度上书写过长江。与前辈诗人从宏大视角书写长江的雄浑壮丽不同,他们以个体化的审美从微观角度写出了长江的现代性气质,具有一种别样的平民色彩。他们的地域抒情显得克制而内敛,更多时候是以叙事的方式和口语化表达切入到对长江的动态描绘,给诗歌书写带来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在他们的诗歌中,长江不再是古典与传统的代言,而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诗学装置。张执浩的诗集《我陪江水走过一程》,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诗人书写长江的主体意志。他经常写到自己漫步于黄昏的江滩,看着川流不息的江水,心生无限感慨。在张执浩的诗歌中,他将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内化为精神层面的长江。虽然他长年在黄鹤楼下的长江边上生活,但他在诗歌中不止于写江景,而是经常从一段江水想到远去的人与事,“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浑浊的/就像你不清楚它什么时候清激过/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逝水/将会以永恒的方式存贮在记忆里”(《我陪江水走过一程》)。

长江的“难处”也可能表征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而长江对于张执浩来说,就是他反观自我、切入时代和保持探索的体现。除了张执浩这一代久居武汉的诗人之外,湖北诗歌界还涌现了一些更具活力和潜力的年轻诗人,如丁东亚、林东林、熊墨、谈骁、秦不语、刘金祥、北溟等。他们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从小在长江边生活,长江已成为他们身上的某种精神气质;而有的人虽然是从外地到湖北学习、工作和定居,但他们的写作同样潜移默化地浸染着长江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气息。这些年轻诗人不再囿于单一思维去礼赞长江的壮丽景观,而是以更具个性化的笔调书写长江的深沉、幽暗与地域纵深感,并以此创造更为丰富且具有动态感的长江文学传统。

从地域视角书写长江,是湖北诗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如果把握不好,也容易变成劣势。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现代性的转化,我们书写长江很容易陷入地方性风物罗列的困境。尤其是以长江作为意象,应当避免陷入同质化和陈词滥调。同时,也要警惕让长江变成一个单纯的符号,只要一写长江,就是各个城市与长江相关的风景展示,这样会落入模式化和套路化的书写窠臼。打破这种封闭的标签化书写,关键在于与长江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在长江文化视域下审视当代新诗的地方性写作,意味着我们不再将长江仅仅当作一个题材或创作背景,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深层的情感结构、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 and 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由此来完成对长江的立体书写与思想重构。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协特聘评论家)